



# 201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 概述



联合国

### 注意

报刊、广播电台或电子媒体不得在  
2012年9月12日格林尼治时间17时前  
引用或摘录本报告内容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日内瓦

# 2012 年 贸易和发展报告

概 述



联合国

2012 年，纽约和日内瓦

---

## 说明

---

-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

- 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称及其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

- 本出版物的材料可自由援引或翻印，但需说明出处及文件号码。应向贸发会议秘书处提交一份载有文件引文或翻印部分的出版物。

---

- 本文所载的概述也作为 201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UNCTAD/TDR/2012, 出售品编号 C.12.II.D.6)的一部分印发。

## 概 述

世界经济继续受到始于 2007 年底的金融危机以及 2008 年 9 月的金融崩溃的影响，尚未能恢复之前十年的增长条件。当时，这种增长条件特别有利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而随之产生的动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动力，在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得到控制之后，帮助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然而，这些国家正在失去这一动力，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再度抬头。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无法回归正常的增长模式，但危机蔓延的问题也同样严重。发达国家的复苏是脆弱的，金融部门未经改革(且不知悔改)，宏观经济政策说得再好也只能说是缩手缩脚，说到最坏处是在起着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增长动力都难以为继，更不用说维持全球经济的增长了。

在美国，乏力的复苏依然容易受到在欧洲所发生的事件的危害，因为双方的金融体系交织甚深。整个欧洲正处于严重衰退的边缘，一些成员历年来一直在倒退。美国和欧洲试图战胜本次危机的尝试都以财政紧缩为主，同时呼吁它们的劳动市场实行进一步的“灵活性”。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限制工资，在某些情况下还意味着大幅降薪。然而，这些政策更可能进一步削弱增长动力并增加失业，并不能刺激投资并创造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正如发展中世界过去 30 年来所采用的类似结构改革政策所显示，这些政策还会加剧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趋势，这已成为金融驱动型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的破坏性特征。

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确定政策导向，并认识到健康的包容性增长需要在就业人口的收入预期良好，企业家有肯定的需求预期的基础上，稳定地拓展消费和产能投资。这需要重新思考设计国家经济政策和支持性国际体制安排时所立足的根本原则。

特别是，虽然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及二者的相互作用既创造了赢家也创造了输家，但要了解这二者在许多国家对总体收入分配状况造成的显而易见的不利影响，就必须考虑这些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些政策已造成失业率上升且居高不下、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增长，且使租金收入流向了位于收入阶梯顶端 1%的人囊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不一定需要对收入分配作重大转变，乃至青睐富人而使穷人和中产阶级无法改善生活标准。恰恰相反，如果国家和国际政策更加适当，并考虑进总需求对资本形成、结构变革和增长态势的至关重要性，创造就业的速度就可以加快，不平等就可以减少，必要程度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可以得到保障。

## 全球复苏：不均而脆弱

2009年年中开始的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复苏一直不均而脆弱。虽然增长在一些发展中区域已重获动力，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仍无法启动，整个私营部门都在去杠杆化，各家各户因高失业率而对未来犹疑不定，政府则慌慌张张地贸然出手统一预算。全球的决策者，包括 20 国集团一级的决策者，对如何穿透笼罩全球经济之上的不确定性的浓雾，并“将所有的船都推上”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增长道路，缺乏清晰的思路。

2011年年末，全球经济显著疲软，而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已于 2012 年上半年浮现。2011 年全球 GDP 增速已有所下降，预计 2012 年将进一步放缓，降至 2.5% 左右。

尽管美国的 GDP 增幅微有上升，且日本增幅更加显著，但因为欧洲联盟(欧盟)当前深受衰退之苦，2012 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增幅可能只略高于 1%。衰退集中在欧元区，而欧元区当局至今尚未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以处理该地区的内部失衡及相关的过剩债务。当局选择的无条件紧缩政策正在扼杀向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回归。确实，不能排除欧洲经济状况出现进一步恶化。

##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增长 一直是由内需和高商品价格推动的

发达国家仍在努力重启复苏，但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 GDP 预期将保持相对高位，约分别为 5% 和 4%。确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设法夺回了危机造成的失地。这主要是源于采取了扩张式的需求方政策。例如，中国只付出整体增长预期小幅下降的代价，就能吸收经常账户顺差急剧下滑的冲击，还不用限

制实际工资的增长。与此呈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尽管经常账户有巨额顺差，却无法避免经济停滞。

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表现上佳，私人消费和工资增长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GDP 增速正在小幅放缓，但预计 2012 年仍能维持在 3.5% 左右。这种增长来自强大的内需，而维持这种内需的是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增长。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一些国家已经在采取反周期政策，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和在货币方面采取更通融的政策。这些国家一直受益于高公共收入和外国资本流量管理等积极的金融政策所创造的政策空间。结果是，投资率上升，失业率降至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经济扩张以及北非国家在 2011 年内部冲突结束后的经济复苏，非洲增长率有所上升。相对较高的初级商品价格有利于外部平衡和财政平衡，使许多国家得以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对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也支持了国内支出和增长。

亚洲依然是增长最快的区域，但也在经历经济放缓，预计 2012 年 GDP 增速将从 2011 年的 6.8% 降至略低于 6%。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已受到发达国家需求减弱的不利影响，以及 2011 年为防止通货膨胀抬头和资产价格上涨而采取的银根紧缩政策的不利影响。由于来自国际经济的“逆风”，这些国家已在此后放松了货币政策，其中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反周期措施。区域增长是以家庭收入的持续扩张、从外需向内需的转变以及高投资水平为基础的。

2012 年转型经济体的增速预期将保持在 4% 以上。这一增速完全归功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的活力。独联体增长的基础，是受到贸易条件收益和(或)巨大的工人汇款刺激的强大内需；而在供给方面，农业部门的复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全球贸易扩张缓慢

国际贸易扩张继 2010 年强劲反弹之后，于 2011 年放缓至仅有 5.5%，2012 年可能进一步放缓。尽管 2012 年上半年日本和美国的贸易量确实有所增长，但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欧元区，贸易量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更有活力，但即使是在这些国家，2011 年的增长也大幅放缓，降至 6-7% 上下。一些商品出口国是例外，因为有从贸易条件的收益，它们的进口得以实现两位数增长。2011 年和 2012 年上半年，这些国家因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从中受益，即使按历史标准，这种价格也依然是很高的。然而，这些价格持续呈现较强的波动性，且在 2011 年头几个月达到峰值之后一直呈下行趋势。

## 全球复苏有相当大的下行风险

全球复苏和良性重新平衡的主要障碍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中，美国继续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经常账户逆差，但因为进口明显收缩，2009 年外部逆差已下降到了 GDP 的 3%。此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保持稳定，而内需增长迟缓。此外，未来的巨大风险是，明年年初之前，不成熟和过度的财政紧缩将可能显著阻滞增长。全球复苏面临的更大问题是，欧洲对出口愈发依赖。德国今天的外部顺差只比危机前低一点点。迄今为止，德国很大一部分顺差都被主要由欧洲其他国家产生的逆差所抵消。然而，当前的危机正在降低收入和进口，而且随着大部分国家都在试图提高竞争力，欧盟的对外头寸可能会转为可观的顺差。整个区域实际上正在试图通过出口走出危机。这可能大大拖累全球的整体增长，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景恶化。

欧洲的危机正被广泛地称为“主权债务危机”，因为公共财政状况自全球金融危机伊始已经显著恶化，且许多国家的利率急



剧攀升。然而，日本、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收益率也降到了历史低点，因此与这些国家相比，大多数欧元区国家的公共财政状况并不显得如此惊险。总体上，在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恶化主要是自动稳定机制的运作和 2008 年底震荡之后挽救金融机构所造成的，不过当时形势严峻，挽救金融机构完全是理所应当。然而 2010 年以来，推行“退出战略”、放弃财政刺激的呼吁以及进行快速财政整顿的呼吁已占据上风。结果是，财政紧缩已成为整个欧元区的“黄金法则”，南欧的成员国不得不承担特别严苛的财政紧缩。这一措施可能不仅会起反作用，甚至会对欧元造成致命损害，并严重危及世界其他地区。

欧洲财政赤字上升只是欧元区危机的表象，并非是其根本原因。经济与货币联盟内长期利率差距极大，其背后的原因，是巨大的工资和价格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成员之间愈演愈烈的区域贸易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在开始形成的时候，最重要的应对工具(即汇率变化)却恰恰已不复存在了。许多关键国家的财政政策受意识形态所限，现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又明显力不从心，因此现在的政策工具必须另辟蹊径。

### 结构性改革不能替代增长战略

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财政政策的作用都需要从动态的宏观经济视角加以重新评估。财政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的变量，依赖于政策选择与体制能力的综合因素。特别是，稳定 GDP 的增长并保持低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助于保障财政空间，并实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无论在全球还是区域，财政空间都没有得到均衡配置，但放缓内需和 GDP 的增长从来就不是帮助整顿公共财政的可行选择。对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前景至关重要，系统重要性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经常账户顺差的国家，要明智地利用其可用的财政空间以恢复增长，并为重新平衡经常账户提供支持。

进一步使全球复苏前景黯淡的是，发达国家的决策者，特别是欧洲的决策者，现在似乎再一次把希望寄托于“结构改革”。然而，解开这些改革的语言密码，其实质就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包括削减工资，削弱集体谈判，并加大部门间和公司间的工资差距。这一结构改革议程背后的推理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一推理完全是基于微观经济考虑，而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决定因素的宏观层面。紧抓着这种改革不放，在当下失业率上升、个人需求下降的形势下可能是危险的。此外，重新平衡措施不对称，完全让欧洲边缘地区那些受到危机冲击且经常账户有逆差的国家肩负调整的负担，注定会进一步危害区域增长。

## 需要重振全球治理改革

2008 年为了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协调而建立的 20 国集团进程已经失去动力。尽管受货币投机驱动的汇率失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它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际金融改革是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危机促使各国考虑制定议程，为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更加安全的基础，但决策者对此的关注依然时断时续、犹豫不决。

现在看来，大好时机已经一去不返，绝不要“浪费严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这一建议无人理睬。金融危机和挽救措施已导致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而金融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其政治影响力。金融产业集体行为的指导原则依然是短期回报而非长期生产力，即便今天也是如此。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活动或许能再次成功规避监管，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近期的银行业丑闻就是鲜明的证据。

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去杠杆化即便得到批准，也可能再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去杠杆化的过程未能有序渐进，而是因为出现新的震荡，银行资产负债表突然承压而强迫去杠杆化，那么，它也可能会影响国际银行借贷。在此方面，能否获得

贸易融资的问题特别令人关注，可能需要新的全球举措，以确保发展中国家不会受到外部信贷紧缩的不利影响。

## 收入不平等加剧：过去三十年来的一大特征

财政紧缩，加上工资限制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弹性化，不仅导致经济收缩，还会在收入分配上产生更大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对社会凝聚力的威胁在一些国家已经明显可见。然而，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完全不是近期出现的现象；尽管新千年之初以来，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趋势已经停止。但这依然是过去 30 年来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较为稳定的分配维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自 1980 年前后，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都下降了。在几个发达大国，1980 年至 1995 年间就出现了大幅下降，当时上升的失业率开始对工人造成压力，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平均工资开始落后于整体生产率增长。这一趋势在一些国家持续了二十年。随着许多发达国家采取压缩工资的方法应对当前的危机以及失业率创下新高，这一趋势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在若干发达国家，伴随这一趋势，收入最高的群体和收入阶梯底层群体之间出现了鸿沟。

在发展中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工资所占的份额也有下降的趋势。然而必须记住，相比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职能收入分配数据不太能说明问题。这些国家的活跃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自谋职业者，从事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活动或零售商业活动，如果将他们的所有收入都视作资本收入，会导致错误结论。

## 1980年后所有区域的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

个人收入分配反映利润和工资之间分配情况、不同收入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家再分配情况；在战后，这种分配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日趋平等，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后，收入差距拉大了。衡量各收入群体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证实了这一趋势：1980 年至 2000 年间，22 个发达国家中有 15 个出现了个人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不过在其中的 8 个国家，这一趋势在 2000 年之后有一定程度的扭转。

在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通常比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更加显著。和发达国家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三十年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拉丁美洲国家除外。但 1980 年至 2000 年间，所有发展中区域的不平等状况都普遍加剧。进入新千年以来，各发展中区域的收入分配趋势发生了差异。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在 18 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有 14 个国家不平等状况加剧。到 2000 年，这一区域的整体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峰值，但在此之后，这 18 个国家中有 15 个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然而总的来说，不平等状况比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严重。

1980 年至 1995 年间，如同拉丁美洲一样，非洲作为一个整体不平等程度在已经较高的情况下继续上升，但这一上升比其他区域晚开始几年。在 23 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中，有 10 个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包括几个人口大国)，另有 10 个国家不平等状况有所减轻，而余下 3 个国家则保持不变。1995 年后，25 个国家中有 15 个收入差距缩小，主要是在南部非洲和西非，但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 10 个国家中，有 6 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在亚洲，虽然个人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低于其他发展中区域，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体现在两个方面：各收入群体的收入差异加大，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也上升了。不平等状况加剧在印度尤其显著，在东亚和东南亚也有所加剧，1980 年至 1995 年间，在 9 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国家中，有 7 个出现了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东亚的不平等状况在 2000 年之后继续加剧，不过速度较慢。在许多亚洲经济体，金融活动所获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其他活动所获收入的增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不平等状况也显著加剧。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 2000 年之后。尽管平均实际工资快速上升，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却有所下降，工资差异也在多个层面上加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差异加大、内陆和沿海区域差异加大、特定职业的技术工人与技能水平较低的移徙工人差距加大。1985 年以来，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也上升了，但相比国际水平依然较低。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欧和东欧的收入分配在所有国家组别中是最平等的。而随着中欧和东欧国家转型为市场经济，工资在 GDP 中所占份额急剧下滑，这一区域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加剧幅度超过所有其他区域，不过仍然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所有区域，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都与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中有关。拥有的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不仅是收入来源，也便于获得信贷以及参与政治决策的特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在此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在拉丁美洲尤其严重，那里收入不平等也最为显著，而在东亚和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所有权则相对不那么集中。

## 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吗？

过去三十年来收入分配的变化是与贸易和金融的加速流动，国际生产网络的扩散，技术的高速变革等同步发生的，其主要原因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设想，即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构变革无法避免的副产品，甚至是这一变革的前提。然而，上个世纪也一直在发生结构变革，其中有些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低。

确实，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生产链和制成品的国际贸易，都刺激了全球化。此外，相比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技术变革，近几十年来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方面的进步速度可能更快。但在此之前的几十年，生产力的增长很快，这也是事实，但因为同时创造了充足的新就业岗位，收入差异反而缩小了。

## 发达国家的结构变革和公司战略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去工业化”时期，它们近几十年的结构变革因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而成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加强而成型。在一些国家，伴随这种改变的，是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的调整——即，与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需求相比，对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降低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量的增速加快，这主要是离岸生产造成的。

这种迁址生产的做法愈发频繁，个中原因不仅是贸易自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加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且也是发达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进行公司战略变革。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导致管理者只注重公司的短期盈利能力以及提高公司股票市场价值。这一方针已经改变了公司在高失业率情况下应对竞争压力的方

式。公司不再着眼长远，不再通过投资和创新提高生产力，从而进一步升级其生产技术、改善产出产品构成，反而更加依赖于将生产活动搬迁至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低薪地区，并试图通过压缩工资降低国内单位劳动成本。工人持续面临失业的危险，讨价还价的地位被削弱，这种情况增强了赚取利润者对工薪阶层权势，从而更便于公司采取上述战略。与此趋势相关的是，掌握不同技能的工人之间工资不平等加剧，掌握相同技能但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人之间工资不平等也加剧了。

### 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状况的 结构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

不同发展中区域和转型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加剧，但它们的发展路线却有很大的差异。在一些国家，比如有些亚洲经济体，不平等状况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加剧。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不平等加剧发生在经济停滞或萧条时期，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转型经济体。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还有一些转型经济体，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不平等状况加剧是在“过早”去工业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劳动力脱离了正规部门的制造活动，转而走上生产力低、薪酬也低的就业岗位，例如从事非正规的服务业和生产初级商品等工作。工业就业率下降，同时实际工资绝对值出现大幅下滑，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降幅达 20%-30% 上下，导致收入差异增大，同时人均收入增长停滞或下滑。

一种解释是，许多自然资源丰富且工业部门刚刚起步的国家发现向国际竞争开放之后，难以维持动态的结构变革进程。这些国家不像发达国家，尚未获得技术创新的能力，无法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升级到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的活动。此外，这些国家又与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低收入国家不同，没有或者不再拥有大

量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发达国家公司的离岸劳动密集型活动中获利也不如低收入国家多。那些相对早些时候获得了一定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可能也受到了其他低薪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量增长的不利影响。

然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债务危机之后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这些国家获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实施了结构调整方案，在此背景下，与贸易自由化同步进行了金融自由化，同时实行国内高利率，以抑制高通货膨胀率或吸引外资。这往往导致货币估值过高、国内生产商竞争力受损以及工业产量和固定投资下滑，即便国内生产商试图通过压缩工资或裁员应对价格压力，也无济于事。

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和许多非洲国家，制造业部门增速不够，无法创造充足的就业，且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被非正规和低薪的就业岗位吸收了，而农业上的价格自由化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在非洲尤甚。自由化就算有益，受惠的也主要是交易商，农民所获甚少。此外，虽然工业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情况，比如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许多国家就是如此，但从事生产并创造就业岗位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活动，这些活动未能启动并维持深化工业化的活跃进程。结果是，专门生产初级商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传统模式即便谈不上被强化，至少也是保留了下来。

##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些改善

过去十年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是在外部条件改善的背景下，特别是初级商品的国际价格提高，偿债负担减轻的背景下发生的。然而，由于内部结构和国内政策不同，外部条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并非一致。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所有



权通常高度集中，石油和矿物产品价格的上涨容易加剧收入不平等。尽管如此，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2002年以来已经成功地将贸易条件收益转换为整体经济中广泛的收入增长，从而成功缩小了收入差距。得以实现这一成果的方法是，增大财政收入并推行有针对性的财政和工业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在初级商品部门之外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支出，在公共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在与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行业和制造业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and 更加渐进的所得税也非常重要。此外，许多国家提高公共收入，以增加社会支出。若干国家还采取了有管理的汇率体系和资本控制的措施，目标是堵截投机性资金流入，并防止货币估值过高。

### 亚洲高速工业化，不平等状况加剧

在许多东亚经济体和东南亚经济体，支持生产性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工业政策在全球化增强的背景下刺激了高速的工业化并支撑了经济增长。在这些次区域，高生产力活动，主要是制造业活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近几十年收入分配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劳动力得以脱离生产力低下、往往是农村的就业岗位，转向生产力更高的工作。这些职业的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工资，因为技能掌握较好的工人供不应求。此外，金融自由化造成金融活动收入比其他活动的收入增长更快。如果收入不平等达到了阻碍国内市场发展的程度，那么，采取步骤，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这将有利于国际和(或)区域生产网络中的生产从工资低、技能低的专业生产中升级。

在中国，地区收入差异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增大，也是不平等加剧的表现形式。这似乎是由财政权力下放以及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导致的，这种政策有利于临近国际贸易路线的沿海地区，重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生产而轻小规模生产。

与此同时，工薪阶层内部的差异也使整体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工资分配转而偏向高科技、金融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熟练工人，而与有正式居留证的城市工人相比，来自农村地区的移徙工人工资低，社会福利也差。

## 外国直接投资和生产迁移的作用

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投资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将各生产阶段外包给某个国家，再将这些生产阶段的产出浑然一体地融入不断发展的整体生产流程。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它们通常将其技术的一小部分转移给其境外子公司，使本国开发的先进技术与国外的廉价劳力相结合。过去二十年来，虽然存在失业率高的具体情况，也可能出现了与过去低失业率时期相反的具体情况，但对外直接投资不时地向制造业的工资和就业施加下行压力，这可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好有坏。然而，仅有外国直接投资永远不足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既不会倾向于劳动力的流出，也不会倾向于劳动力的流入。反常的是，母国和东道国在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工资设置方面对直接外资的增长采取了相似的回应：母国试图通过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并向工资施加压力，以遏制向国外迁移生产的趋势；而东道国也采取努力，创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吸引额外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地，政府常常采取降低赋税的方式，以增加跨国公司的净利润，并以财政手段限制它们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潜力，其目的是，创造区位优势，或者弥补所谓的区位优势。

## 转折点：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友好型”政策改革

要理解不平等状况加剧的原因，应该记住，不平等状况加剧的趋势是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政策的广泛重新定向同时发生的。在许多国家，伴随贸易自由化的是国内金融体系监管放松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导致国际资本流量高速扩张。国际金融有了自我生存之道，逐渐地不再为实体投资或国际商品流动提供资金，转而投身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交易。相比通过新投资创造财富，这种交易的获利往往多得多。

更广泛地说，过去更具干涉性的公共政策方针高度侧重于降低高失业率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而这种方针被放弃了。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过去的方针不能解决 20 世纪 70 年代后五年许多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问题。因此，它被一个更加“市场友好型”方针取而代之。这种方针强调要消除被认为会扭曲市场的因素，它所依据的是一种对市场超级静态效率的信念。这种全面的重新定向需要改变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几乎完全是以打击通货膨胀优先，同时在工资形成以及在“聘用和解聘”条件中引入更大的灵活性，目的是降低失业率。这一方针背后的理念是（基于静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推理）灵活的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能推涨净利润和(或)总储蓄，从而加强投资。

在金融活动扩张的背景下，不平等加剧往往导致更高的债务，因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无法在不借贷的情况下增加或维持其消费。这进而增加了金融资产拥有者的收入，往往会加速不平等。此外，当过高的债务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时，不平等程度就会屡屡上升，因为危机造成的损失通常会给最贫穷的人群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

虽然这一政策导向的转变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但这种新思维也开始在随后的几十年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过程。特别是，许多国家被迫遵守国际金融机构援助的

附加条件，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听从国际金融机构依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政策建议。

## 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和税制改革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这一新的政策导向意味着放松管制，实行更大的灵活性。工人不愿接受更低的工资，这被认为是造成失业惯性的主要原因。一些国家的工会在过去颇有影响力，但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环境下，其影响力遭到了削弱；另一些国家的工会本来就影响力很弱，而在这种环境下，其影响力则更是无从加强了。因此，在工资谈判中，力量的重心转向雇主；与总体生产率的增益相比，工人的工资增幅较低，导致在总收入中的利润占比普遍提高。

在 2008 至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再度攀升，但奇怪的是，这不仅没有激发最发达国家对上述方针的重新思考，反而促使它们重提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所谓优越性。只有少数国家的政府，尤其是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未迎合这一取向。这些国家着眼于采取各种政策，以改善穷人的经济境况，增加工人的谈判筹码，而同时又不影响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就财政政策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经济政策重新转向实现政府干预最小化和加强市场力量的原则，进而消除了由税收造成的“市场扭曲”。这一观点认为，税负和公共支出的分配主要应根据效益标准来决定，而不是从分配因素来考虑。降低公司的利润税，降低最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收入税税率，能加强积极性，增加公司用于投资的财务资源。另外一些支持对高收入群体和公司利润降低税负的人认为，此举可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从而增加社会总储蓄，因为这些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高于普通群体。据说，这进而也会引起投资的增加。

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这种自由主义的税制改革降低了税收与 GDP 之比，降低了边际税率，并强化了公共收入体系中对收入分配产生累退效应的因素(也就是税负不成比例地由较低收入群体承担)。在发达国家中，直接税收占 GDP 的比率大幅降低，也与这种改革有关。

###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缩小

发展中国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财政改革，同时，贸易自由化造成关税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公共收入减少，或者说阻碍了公共收入的增长，使政府未能在促进发展和改善收入分配方面扩大范围。20 世纪 80 年代官方发展援助人均流量停滞，90 年代绝对值大幅减少，使这一问题更形恶化。结果是，许多国家减少了公共服务，或对公共服务征收使用费，这种情况常常会产生累退效应，或使得低收入群体无法享受此类服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尤为严重。

直到最近，官方发展援助付款才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历史最低点回升。然而，这部分增长的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少数经历过数年冲突的国家，或是以债务减免的形式提供给债务拖欠额越来越多的国家，因此，这对多数受益国的经常预算所产生的影响很有限。官方发展援助中用于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支出的比率也在不断上升，这对受益国的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官方发展援助在这些方面的比重增长，意味着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方面促进增长的投资比重相应减少，因此，它在结构改革和创造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方面的影响有限。

### 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改革失灵

多数国家不平等状况加剧的根本原因是，平均实际工资增幅不足，加上税制改革不适当，但是，这并没有产生所承诺的加速

增长，降低失业率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任何政策方针，如不承认收入分配对需求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作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收入分配向高收入群体的转移带来更多的储蓄，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公司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降低。当工资的增长跟不上生产率的增长，需求最终会与生产潜力脱节，因此生产能力利用和利润也会降低。通常，这反过来会造成投资的减少，而非增加。

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就业更加不稳定，这系统地扰乱了内需，不仅没有降低失业率，反而使之上升。这表明，仅仅依赖简单的市场机制，这不能防止劳动力市场出现不平衡。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激增之前，也就是从 2007 年低于 6% 的平均值增长到 2011 年的接近 9% 之前，工资占 GDP 的比例已经降到了二战后的最低水平。这种情况对消费需求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在部门或公司范围内，无论是降低平均工资，还是扩大工资差距，都不能指望以劳动换取资本，或降低整个经济的失业率。此外，通过扩大公司间的工资差异来克服发达国家当前的危机，这也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因为这会减少公司间的利润差距。然而，市场经济中驱动投资 and 创新的，正是这种利润差距。如果公司效益低下，又不能通过削减工资来抵消减少的利润，它们就不得不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创新来生存。

同样地，凭借生产率的增长而降低出口价格，这在初期可能会使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但这是不能长久的，因为这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当许多国家同时推行这一战略，而其国内的生产商又都参与国际竞争时，这往往会造成工人工资螺旋式下降。这种做法会使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分享不到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对于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企业税收方面的国际竞争，其道理相似。

## 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重新定位势在必行

首要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改变收入分配方式，从而使整个社会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扶持就业、促进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外，合理的收入政策对于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上拉大收入不平等，同时增加创造就业的需求，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任何收入政策的核心特点都应是保证平均实际工资与平均生产率同步增长。名义工资的调整应考虑通货膨胀目标。因为原则上，只有当某个经济体中的工资增长与平均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并将通胀目标考虑进来，工资占 GDP 的比例才能稳定，经济才能整体上创造足够的需求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经济体才能避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避免不得已而一再推行“以邻为壑”的政策，以便为自己的过剩供给创造需求。

实施这一原则时，工资的调整应具有前瞻性。这意味着，工资的调整不仅要与生产率趋势相一致，还要与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下一阶段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而非依据上一阶段的生产率实际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也就是“后顾式”的)。后者只能保持通货膨胀不变，却不能保证实际工资达到预期水平。将工资与生产率的增长和中央银行官方通货膨胀目标挂钩，也可以帮助中央银行预防通货膨胀，并提供更大的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体协商机制有助于制定一个成功的收入政策。

工资增长与总体生产率增长和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其主要作用是，保持工资所占比例不下降，防止相同职业的工资差距扩大。同样，工资比例下降，个人收入不平等扩大，过去几十年多数国家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时，政府可尝试恢复工资比例，缩小收入不平等。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达成预设的社会共识，可通过雇主和工人协会间的集体协商，辅之以政府建议或工资调整的一般指导原则达成这种共识。

还有其他途径可用来修正市场的表现，使情况更有利于弱勢的谈判方。这些途径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设立最低法定工资，征收累进税，其收益可用于支付不断增长的社会转移支出。还可提高公共支出，用于改善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使更多人可以负担得起这些商品和服务。

## 发展中国家收入扶持措施

上一段末尾的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适用，因为普遍来说，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需要更大幅度地减少收入不平等。通过细化劳动分工和利用机会引进先进技术，这些国家在提高生产力发展方面有很大潜能。这意味着，在更平等地分配生产力增益，并促进需求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这些国家也有相当大的空间。

发展中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初级商品的制造和出口，因此毫无疑问，增长和创造就业之间的关联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初级商品国际定价的波动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业绩影响很大。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很大，小规模自谋职业的情况也很常见。在许多这类国家中，制造业部门的正规就业在全部付酬职业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且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工会和集体协商通常所发挥的作用也小得多。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非正规就业和自谋职业者的收入及购买力，以此作为对正规部门收入政策的补充。

将农产品价格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相挂钩，这种机制能有助于逐渐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最低法定工资的实行，并根据经济体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和通货膨胀率目标予以定期调整工资，这些都对投资—生产率—增长的态势产生积极的影响。除了减轻最低收入者的贫穷以外，这一举措也能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这种需求的增长主要是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此外，最低法定工资水平及其最终的调整，可以



为更大范围内工资标准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不可否认，在非正规部门占比较大的经济体中很难实施最低法定工资标准。因此在此类经济体中，有必要增加公共就业，并实行增强小规模生产的战略，以对这种立法进行补充。

## 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除了劳动力和工资政策外，财政收入方面对收入和累积财富的征税，财政支出方面的社会转移及普遍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都在影响分配结果方面产生关键的作用。

累进制征税可以减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其减少甚至总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当新增税负分配的累进程度提高时，税收和政府开支的增加会产生更强的净需求效应，因为部分新增税收是高收入纳税人群体牺牲储蓄款上缴的，而相对较低收入群体来说，这一群体更倾向于存款。

发达国家在战后头三十年，边际税率和企业税率较高，但投资也较高，其中的经验表明，决定企业家们是否愿意向新生产能力投资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某一时间内的净利润，而是对生产能力提高后新增产品和服务的未来需求预期。当公共支出增加，并通过其收入效应刺激个人需求时，这种预期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提高。

事实上，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减少收入不平等，其空间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尤其是对收入最高的群体征税，加大税率表的累进幅度，并不会抹杀高收入者的绝对优势，也不会打消其他人提高收入级别的积极性。提高对租金收入和资本利得收入的税收，降低对企业活动利润的税收，虽然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的做法正相反，但在非生产性金融活动过分扩张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正在日渐显现其正当合理性。

## 发展中国家也有税收空间

通过累进税有效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经济体需要具备较高程度的正规就业和相当大的行政管理能力，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当前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然而，这些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一些潜在的收入来源，可有助改善平等状况并增加政府收入。

对财产和遗产征收更高的税率，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掘的一个潜在的财政收入来源，这能减少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并扩大政府的财政空间。例如，相较于个人所得税，对房产，巨大的地产、耐用奢侈品和金融资产征税通常更容易些，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

对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采自然资源所得收入及由国际初级商品价格上升所得利润，是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通过正当征收一部分初级商品租金，尤其是在石油和矿产部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保证全体人民都能从自然资源的财富中获益，而非仅仅几个国内外行为者。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初级商品的价格越来越高，因此过去十年自然资源的收入潜力大幅提高。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定空间更改对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征税。发展中国家常常试图通过财政上的让步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然而，通过更低的税率与其他潜在的东道国竞争，会导致一些问题，因为这会引发税收螺旋式下降，缩减所有相关国家的财政空间，同时通过降低税收在最初建立起来的地方性优势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 通过公共支出减少收入不平等

目标明确的社会转移支出和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服务也能有助于减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例如，增加教育支出，尤其对较贫

穷的国家来说，会有助于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但受教育者必须能获得工作机会。然而，创造就业依赖于整体经济增长动力，尤其是正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扩大。

公共就业计划，如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计划等，使失业有所减少，并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为当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了需求，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积极影响。即使是收入低、行政能力弱的国家也可实施上述计划，并可将其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相结合。筹划得好的话，这种计划也能有助于吸引工人进入正规部门。

通过提高税收所得的收益可用于以不同形式对城市工农业部门中的小生产者提供优惠贷款和技术支持。除了能促进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外，这类融资还可作为吸引小企业家和工人进入正规部门的一条途径。

## 国际层面

在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越来越受到外部发展和其他国家的政策的影响。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剧烈波动，汇率失衡，会导使不同国家生产者间的国际竞争产生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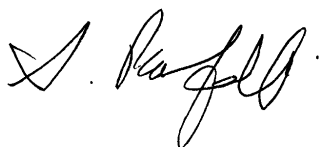
货币市场上的这种不当定价引起了宏观经济震荡，影响到了整个经济，因此不能在企业层面上进行解决。应对这种震荡的恰当方式是使相关货币升值或贬值，而不是在那些生产商失去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中削减工资。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反映通货膨胀率差异的变化和单位劳动成本的上涨。此举也能够防止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以邻为壑”的行为。

国际框架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各国处理固定资本转移的方式。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协调，以避免相互间的工资和税收竞争。这种协调的目的应该是，责成外国公司履行两项原则：全面

接受国家税收计划；根据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通货膨胀目标调整实际工资。这两项原则会为国内的企业定下一条标准。外国投资者用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低工资相结合，会产生(常常是巨额的)额外利润，而国内企业并不会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这部分利润，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是随整个东道经济体平均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的，而不是随他们自身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的。

\* \* \* \*

以上考虑的所有问题，都是想表明：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市场过程取得有效成果，并不需要加大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也不需要进一步拉开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就业和再分配措施，实行扶持性的宏观经济、汇率和产业政策，以促进生产性投资并创造就业岗位。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总体需求、投资和增长，反过来也会加速创造就业，包括薪酬较高，社会福利较好的高生产率部门中的就业，从而进一步减少社会不平等。



贸发会议秘书长  
素帕猜·巴尼巴滴先生



